

热历史

古代的师徒传承

□林海

在中国古代，行业内的师徒关系既有不成文的规矩惯例，也有明确规定收录的行规手册，甚至还有些作为附录被记入了官方的法典。

许多行业技能的传授，是通过家族式的经营与训练。古语称：“家其专业，以求利者。”为了防止技术外传，通常传男不传女，以防女儿出嫁后导致技术外流。将专门技艺作为家产传给子孙的习俗，甚至得到了官方的认同和保护。

《考工记》上说：“巧者述之守之，世谓之工”，并注：“父子世以相教也”。《国语·齐语》还解释了世传技艺的好处在于：“其父兄之教，不肃而成；其子弟之学，不劳而能。夫是，则工之子恒为工”。耳濡目染，教者省力，学者亦快，结果便形成了《荀子·儒效》上说的“工匠之子，莫不继事”的传统做法。

从官方的角度来看，也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管理工匠。《魏书·刑罚志》说“其百工伎巧，驺卒子息，当习其父兄所业”。唐宋之后，匠户、灶户等“百工”开始纳入“匠籍”管理。元明两代，手工业者一律编入匠籍，隶属于官府，以轮班方式国家服役。当时的户籍制度分为民、军、匠三等。从法律地位上说，一世为匠，手艺和义务都世代承袭，不允许私自分户，不得脱籍改业（据《明会典·工匠二》）。

因此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，主要是采取亲子传承的方式来发展手工艺技术。但是，有的师傅没有子嗣，或者生意扩大，需要雇佣学徒帮工，才出现了师徒之制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师徒制是一种对于父子传承制的拟制，在习惯法上难免延伸使用家族之治的理念。对于作为外姓的徒弟而言，师傅如果愿意倾囊相授，是十分可贵的。师傅如果不传授核心机密，为防“教会徒弟，饿死师傅”，也并非不可理解。

随着匠籍制度的瓦解和师徒制度的发展，越来越多徒弟在学成之后，开始自立门户。正如民间所言“一技在手，走遍天下”。但是，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，如果“教会徒弟，饿死师傅”成为常态，那么再不会有师傅愿意教授徒弟技艺，技术传承和行业发展势必受到影响。因此，师傅在选徒和教徒时，在意志



▲山西博物院展出的陶艺工匠蘸釉吹釉、描绘青花场景 记者 刘亚 摄

力、人品、能力等各方面都会严格要求徒弟，很多时候甚至于百般挑剔，使徒弟过着如履薄冰一般的生活。同时，他们也非常重视培养弟子的封建宗法观念，从思想上使弟子对自己终生感恩。

其实，这种师徒之制，早在很早的时候就在道德层面进行了规定。《管子·弟子职》规定：“先生将食，弟子饌馈。摄衽盥漱，跪坐而馈；先生有命，弟子乃食”“先生将息，弟子皆起。敬奉枕席，问所何趾”“先生既息，各就其友；相切相磋，各长其仪”。但作为行会、公所的行规加以规范，是迟至明清时期才有。

明代织造业行会规定了徒工制度，但是仍然倡导手工技艺尽量要父传子继：“不论店间工司，就地父传子业，亦以满师例”“子承父业，或长或嫡，以亲生一人照满师例，其余亦可向公所报名入行”。一般徒工要学徒三年，但准许亲生儿子一人免去学徒期，其余子侄学艺则与一般徒工的待遇相同。很明显，在官方和行会看来，儿子有学徒和开业上的优先权，父传子业也有着天然的正当性。

根据苏州行会规定，为了限制竞争，也为了控制技艺的传播，徒弟人数受到严格限制。通常规定，授徒每三年一期，每期一人，不许重叠招收——“每人须三年乃授一徒，盖以事此者多，恐失业者众也”。如果不遵守此规定，行会则有权予以惩罚。在苏州金箔行规定每姓只能授徒一人，违规时惩罚也非常严酷。

在石湾，根据陶艺工会行业规定，学徒未入行前，只能从事最为粗笨的基础工作。工资只有入行师傅的几分之一。各行制陶技术也规定只传男不传女。女工只能做少数

的日用器皿。各行会从业人员要缴纳“行金”才能入行。光绪年间，入行的行金分为三种：第一种是父传子。凡父亲已入行，儿子（必须要有血缘关系）要入行的，交入行费9元白银，分三年交清；第二种是兄教弟，兄已入行的，弟要交入行费18元白银，分三年交清，并要先做两年学徒；第三种是从师学艺，无父无兄在行的，要有师傅接受其入行，每季交入行费白银12元5毫，学徒期长至6年。

不过，行会同时也规定，一旦确立了师徒关系，师傅则必须尽力传授技艺。学徒期满离开师傅独自开业时师傅赠送一套工具，师傅去世后徒弟要准备孝衣，并以孝道待之。但是，许多师傅仍然藏着一手“绝技”不肯传给徒弟。所谓绝技，有时就是“秘不外传，难免断绝”的意思。例如制笔业中的金陵陆继翁、王自用，吉水的郑伯清，吴锡的张天锡，杭州的张文贵等都有绝技，所制毛笔各有特色，却因“不妄传人”而“惜乎近俱传失其妙”。制陶业中的宜兴陶家对陶土的“取舍、配合各有心法，秘不相授”；彝鼎业中的松江胡文明能“按古式制彝、鼎、尊、卣之类，极精，价亦甚高，誓不传他姓”。于是，这些传统技艺便大多失传而绝。

今天传承下来的很多技艺，都是学徒偷师而来。清末广州制革业中的熟皮配料是关键技术，由师傅掌握，配料时在小房内操作，有时还把窗帘拉住，不让徒弟看见。徒弟只能在日常帮师傅做活时用心观察，对关键技艺还不能随便打问，全靠心领神会。或者，师傅在晚年或临终前才单传给最可靠的弟子。不过，这种防范式传授也容易导致技艺失传。 （《法制日报》）

生活史

漫话八仙桌

□许若齐

祖上曾经“阔过”，家道中落了，最后留下的，肯定还有一张八仙桌。那桌子没准是红木的，很沉很沉，用了好几代人了还暗幽幽地发着光亮。太爷用瘦骨嶙峋的手抚摸着，一字一句叮嘱子孙：家境再窘迫，都要留着；要是变卖了它，后面就是讨饭的日子了……

八仙桌的来龙去脉，民间有诸多传说，难免牵强附会。不过它的名字起得确实好，一桌四方，东西南北，八人落座，以仙喻之，飘飘然固然不会，稳当舒坦却是实打实的。它在主人家的地位也是相当彰显的，总在厅堂居中，背靠长条案几，案几上东瓶（平）西镜（静），中间一时钟（终生）；条幅对联高悬，两边是祖宗画像照片，或慈祥或庄重；左右两把太师椅拱卫，气派格局都有了。

大凡家庭的重要活动，都与它息息相关：祭祖、会客、聚餐……有时也进行着通宵达旦的娱乐活动：打麻将、推牌九……饼筒条掷于其上，声响不绝，显示桌面材质的不同凡响。

八仙桌的结构是相当简单的，仅腿、边、牙板而已。造型与结构在明代已臻完备。一张标准的八仙桌应是形态方正，结构牢固，桌面平整，任你摇晃，立地纹丝不动。红木、黄花梨木材质的，当然不是一般百姓人家所能问津，但榉木之类还是要的，至少传三代，百年后身子骨依然结实硬朗。八仙桌的制作尽管不复杂，但绝非一蹴而就。用传统的斧锯刨工具为之，浑身上下且不用一钉一铆，这可不是朝夕之功。 （《安徽日报》）



▲临猗县大运农耕文化博物馆中的八仙桌与条凳
记者 刘亚 摄

文史拾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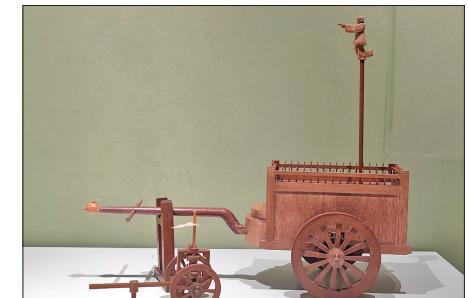
指南车

传说黄帝和蚩尤大战3年，交锋72次，都未能取得胜利。蚩尤一会儿呼风唤雨，一会儿制造大雾，使得黄帝的军队常迷失方向。

在一次大战中，蚩尤眼看就要战败，他又放出大雾，霎时四野弥漫，部队深陷其中。黄帝十分着急，只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，马上召集大臣们商讨对策。众大臣都到齐了，唯独不见风后，黄帝只好亲自去找。

在一辆战车上，黄帝找到了风后。只见风后独自一人在车上睡觉，黄帝生气地说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在这里睡觉？”风后慢腾腾地坐起来说：“我哪里是在睡觉，我是在想办法。”接着，他用手向天上一指，对黄帝说：“您看，为什么天上的北斗星斗转而柄不转呢？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现象，制造一种会指方向的工具，有了这种工具就不怕迷失方向了。”之后，由风后设计，大家动手制作，经过几天几夜奋战，终于造出了一个能指引方向的仪器。风后把它安装在一辆战车上，车上安装了一个假人，伸手指着南方。然后告诉所有的军队，打仗时一旦被大雾迷住，只要一看指南车上的假人指着什么方向，马上就可辨认出南北东西。

从此，黄帝的军队再也不怕蚩尤的大雾了，人人奋勇争先、骁勇善战，大家一鼓作气终于打败了蚩尤，打通了中原的道路，控制了黄河中游一带。可惜风后却在这场战役中不幸遇难，黄帝悲痛万分，亲自为他选了坟地，把他埋葬在黄河以北今天山西芮城县的赵村。后人又把赵村改名为“风后陵”，意为风后的陵墓。“风陵”也就是现在的风陵渡。 （山西人民出版社《山西故事》丛书）



展出的夏县宇达青铜文化产业园
记者 刘亚 摄

红色记忆

一把军号



在山西省沁源县城的望台小区，住着一位老八路，他叫王栓柱，是原太岳军区南进支队57团的战士，1942年至1944年在中条山一带打击日寇，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他所在部队编入晋冀鲁豫军区。

解放战争时在攻打长治战斗中，王栓柱受了伤，在老家养好伤后部队已经转战打到了山东，他联系不上，从此就没有归队。2017年垣曲县革命老区纪念馆馆长杨金玉在省军区开会时，与沁源县的一名感动山西国防动员新闻人物住在一个房间，当听说有这么一位老八路时，杨金玉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散会后没有返回垣曲，直接和

杨金玉怀着敬仰的心情离开了老人的家，返回垣曲。

201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，杨金玉怀着对老人的敬重，给老人家里打了个电话，得知老人病重住院了。他放下电话，即刻动身，于当日晚9时赶到沁源。病榻上的老人苍白消瘦，说话无力。家人说老人得了肝癌，已到晚期。这时老人睁开了眼睛，看见他，用当地方言吩咐家人，让把军号拿来。大约过了1个多小时，他的女儿拿着军号来到了老人面前，老人接过军号抱在怀里，足足有10分钟，然后郑重地把它放在杨金玉的手中。这时，杨金玉已是泪流满面。

四天后，老人离世了。得知噩耗，杨金玉再一次赶到沁源，与一位他敬重的老人、一位八路军的老战士做了最后的告别。（王雪花）